

文明的衝突與會通*

戴璉璋**

一、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季刊的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全球文明衝突論〉。他說：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將是文明之戰，而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是未來的主戰場。他出語驚人，引起廣大的回響，港台兩地文化界都有強烈反應。①杭廷頓的〈全球文明衝突論〉要旨如下：

(一)今後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取代意識型態與經濟利益的衝突而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戰場。

他所謂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在歐洲大致是西元1500年西方基督教的東部邊界。這條線沿著今日芬蘭與俄羅斯以及波羅的海三小國與俄羅斯邊境向南延伸，而貫穿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境內，向西轉移穿過羅馬尼亞與前南斯拉夫，而到達巴爾幹半島。這條線的北邊與西邊民族，不是新教徒便是天主教徒，具有歐洲歷史的共同經驗，政治與經濟境況較東部民族為優。這條線的東部與南部民族，不是東正教徒便是回

* 本文是戴先生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應邀在中央研究院胡適之先生一〇三歲誕辰紀念會上發表的專題演講摘要。

** 本處籌備處主任兼諮詢委員。

① 台灣《中國時報》在今(82)年6月22日至25日連續刊登了此文的中文譯稿，標題為〈全球文化衝突的時代來臨了？〉。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在今年10月號也登載了此文的中文譯稿，並且還有金觀濤與劉小楓的評論，金文為〈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評全球文化衝突論〉，劉文為〈利益重於文化〉。

教徒，歷史上屬於帝俄或奧圖曼帝國，他們很少受歐洲其他地方發生的重要事件影響，相對於西部，他們的經濟較落後，亦難發展穩定的民主政治。

杭廷頓的文明斷層線，在亞洲則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邊界線，如今這條線也已延伸到印度境內，呈現出印度教與回教的衝突。中國境內也存在著這種斷層線，主要的是信喇嘛教的西藏、信回教的新疆與其他地區的界線。

(二)由於西方掌握了國際政治組織、安全體系及經濟組織方面的絕對優勢，又與非西方民族有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價值觀與信仰的歧異，因此非西方民族就有聯合起來對抗西方的態勢，目前儒家社會與回教世界的軍事結合已經形成。

(三)西方國家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必須對於上述的態勢謀求對策，例如：促進西方文化體系內成員的合作與團結，並把和西方文化比較接近的東歐與拉丁美洲融入西方社會，而且要和日本及俄羅斯加強合作；另一方面則須抑制回教世界與儒家社會的軍事擴張，並且製造他們之間的衝突等等。從長遠的調適來說，西方也應該去深入了解其他文明的基本宗教與哲學主張，並且去明白他們是如何理解自身利益的。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文明」，所可能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

杭廷頓的見解，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外交策略有直接影響。他顯然是西方中心論者，他的論點可議之處很多，但有兩點是值得肯定的。

(一)文明衝突的確是今天世界上血腥衝突的主要事件，我們只要看看新聞報導中前蘇聯境內亞美尼亞人與亞塞拜然人之戰，前南斯拉夫境內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與塞爾維亞人之戰，在中東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戰，在印度回教徒與印度教徒之戰，這就不得不承認杭廷頓的論述是有事實根據的。

(二)杭廷頓在文末指出：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毫無疑問的，這是當前人類的一個重大的共同課題。

但是杭廷頓並未論及：文明共存如何可能，人們當如何去學習與其他文明的族群融洽相處。這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究。

二、文明的會通與中和思想

不同文明的族群，居住在鄰近地區，接觸初期，由於語言的隔閡、信仰的歧異、習俗的差別以及利害的抵觸等種種因素，衝突往往是難以避免的。但是衝突並非必

然會導致暴力相加、血腥殺戮，直至族群毀滅，文明死亡。衝突也可能被化解，不同的文明也可能會通與融合。衝突事件的這兩種走向，決定的因素很多，主要關鍵則在人這裡，在於當事人的智慧與涵養。

從中國歷史上觀察，不同文明的族群接觸之後，衝突事件可以說層出不窮。從上古的黃帝與蚩尤之戰，到後來的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對峙，以及少數民族之間的對抗，由衝突而導致血腥殺戮的事件史不絕書。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中國境內的各族群，實際上也存在著和睦相處、融洽共存，甚至融合為一體的大趨勢。這種趨勢並非偶然倅致，隱隱然自有一種思想作為主導。依個人淺見，中國哲學史裡所謂中和思想當是這個大趨勢的主導思想中最主要的成份。

中和思想，在上古時代由文化領袖們從政治經驗與藝術活動中體悟出來。《論語·堯曰篇》記載著堯、舜告誡繼任者要「允執其中」。所謂允執其中，具體的做法，依孔子解釋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②他認為這是舜的大智慧表現。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即從對立的兩者之間找出可以會通彼此的理路來，使它落實，具體實現。這裡，會通彼此，不是一般人所謂的打圓場或和稀泥，那往往是鄉愿的做法。會通彼此也不是犧牲一方去遷就另一方，那是「偏」，不是「中」。會通彼此的意義，是使雙方在保持各自的特質這一情況下，相應相濟，相輔相成，以共創和諧的新局。所以「中道」就是會通兩端、導致和諧的原理。從這原理的本質說是「中」；從它的作用說則是「和」。和，可以從協調優美的音樂中體驗到；也可以在進退有節的舞蹈中體驗到；當然還可以從個人情感的調適以及人際關係的融洽中體驗到。「和」與「同」不一樣，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③「和」，是多樣的統一，是通過個體的完美實現以成就整體的和諧調適。在這和諧的整體中，個體仍可保持各自的特質。而所謂「同」，則是把組成份子的個體性、差別性都去掉的一種單調的格局。

上古的這種中和思想，後來儒、道兩家都有所繼承。儒家自孔子提出中庸、中行的觀念之後，孟子繼而談中道，^④此後《中庸》、《樂記》以及《易傳》的作者都發揮這方面的思想。他們指出中和的根源是人們真誠的德性，這德性主要表現為對

②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台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第六章，頁20。

③ 《論語·子路》，同注②，《論語集注》頁147。

④ 參見《論語》〈雍也〉、〈子路〉及《孟子·盡心下》，同注②，頁91、147、374。

於各種事物的照察智慧與包容德量。人要有照察一切的高明智慧，才能在各種不同的事物中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地掌握中道；人還要有包容一切的寬弘德量，才能使各種不同的事物各遂其生，各適其性，而在各自成就他的性命當中來體現整體的和諧。這是《易傳》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⑤的境界。儒者據此而宣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⑦試想一個人如果真誠地體認到殊途可以同歸，萬物並育而可以不相害，他的待人處事將會是怎樣一種氣度？

道家方面，老、莊對於中和都有所論述。老子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⑧他的「中」指虛無之道，「和」則是天地陰陽交會的情況。這就明顯地賦予「中和」以本體論、宇宙論方面的色彩。莊子對於這種思想繼續加以發揮，他在〈齊物論〉說「環中」；在〈人間世〉則說「養中」。^⑨而〈田子方篇〉也從天地陰陽這裡說「和」。他說：「（陰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⑩因此又有「與天和」、「與人和」的說法。他說：「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⑪

關於中和思想，道家的後續發展不如儒家之影響深遠。因爲儒家在中和思想方面有一套修養之道，即致中和的工夫。這工夫在《中庸》有自誠明與自明誠兩條路，前者爲尊德性，後者爲道問學，重點都在使人能隨時隨地保持高明的智慧與寬容的德量。宋儒朱熹，在參悟中和方面花了多年心血，他有所謂「中和舊說」與「中和新說」^⑫，後者的重點在確認「先涵養後察識」爲本領工夫。這就真切地印證了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這兩句話。敬，使人精神安定；致知，則使人心量廣大。儒者致中和的工夫，使中和思想能夠具體落實，流傳廣遠，在中國歷史

⑤ 〈乾象〉，《十三經注疏·周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卷一，頁6、7。

⑥ 《易傳·繫辭下傳》，同注⑤，卷八，頁9。

⑦ 《中庸章句》，同注②，頁37。

⑧ 《老子》第五章及四十二章，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117。

⑨ 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世界書局，1978年），頁33、74。

⑩ 同注⑨，頁311。

⑪ 《莊子·天道》，同注⑨，頁206。

⑫ 參考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第三冊（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頁71—228。

中產生巨大的作用。

一般認為不同的文明當中宗教信仰最難調和，因為宗教具有排他性。所以杭廷頓的〈全球文明衝突論〉主要著眼點是在宗教的歧異上。在中國，由於宗教信仰歧異而引起衝突，大致是發生在東漢佛教傳入之後。當時有些人士對於這種來自西域、印度的宗教有種種疑慮及排斥的論調，他們提出夷夏之辨、禮俗之辨，對於佛教有所質疑；並且提出神滅的說法來反對佛教的神不滅主張。佛教徒們對此也有一些辯解。《弘明集》一書就保留了許多這方面的文字。類似的爭辯一直延續至今，一千多年來論題雖有更動，但爭議並未中斷。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佛教與本土信仰——主要是道家與儒家，在長期交往中也有由對立激盪而彼此會通的實情。在會通中，彼此都受到對方的影響而有所蛻變，有所創新，因而更豐富了自己的內涵。於是南北朝以後，道教著作中明顯地接納了儒、佛兩家的材料；隋唐以來，佛教思想也渲染上本土哲學的色彩；宋明時代，儒學的課題也為了回應佛、老思想而有所更新。唐宋以降更有所謂三教合一的說法，例如明代有一位三教主林兆恩，他為《四書》、《道德經》，以及《心經》、《金剛經》、《常清靜經》作注，把儒、釋、道結合為一體，設教授徒，弟子數千人，分佈各地弘道，對於民間信仰影響極大。今天我們在台灣社會不但可以看到佛廟與道觀結隣為伴，相安無事，還可以看到觀世音與呂洞賓同在一個屋宇下接受祭拜，有時孔子也會被請來分享祭品。善男信女們並不那麼計較宗教派別，只求衆神護佑，衆善同歸。我們不能認為這些做法不倫不類，應當正視這種信徒人數之衆多，他遙遙領先於其他各教，在台灣大約已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其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⑬

個人無意宣揚三教合一的思想，其所以要提到台灣社會的這種現象，只是認為它是一個有力的證據，它證明了宗教的歧異是可以會通的，衝突不是歧異的宗教間唯一的途徑。

三、結語

今天，由於交通發達，資訊利便，我們所居住的地球已經越來越小，人們早就

^⑬ 根據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對1989年8月入學的新生所作的調查，學生宗教信仰人數分布的情況如下：佛教27.14%，基督教8.34%，天主教2.48%，民間信仰34.73%，其他26.84%，未答0.90%。其中民間信仰人數最多，超過三分之一。

說它是個地球村了。在這地球村裡，文明歧異的族群，彼此的接觸與互動日趨頻繁。怎樣能免於暴力衝突而走向理性的會通，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中國歷史，無論是在民族的融合或宗教的會通上，都已累積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都印證了中和思想在降低文明的衝突、促進文明的會通方面，能起重大的作用。這樣看來，關於中和思想的傳統資源，今天還有值得我們去善加開發的價值。

依個人淺見，中國如果真能有儒家的精粹思想來引導文化活動，那麼他絕不會像杭廷頓所說的那樣，只因為文明歧異而與不同文化的族群鬥爭不已。再進一步說，西方或回教國家如果能虛心地檢視中國歷史，探究儒學內涵，則必然可以得到一些啟發，而有助於衝突之降低，促進文明之會通。

(後記：本文承翟志成、鍾彩鈞兩位先生提供修正意見，特此誌謝。)